

清南略考实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沈一民◎著



清 南 略 考 实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沈一民◎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南略考实/沈一民著.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 - 7 - 81129 - 130 - 8

I. 清… II. 沈… III. 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明清时代
IV. 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3553 号

责任编辑 刘乃翘 安宏涛

封面设计 袁 洁

清南略考实

沈一民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 - 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21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130 - 8

定 价 19.80 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欢迎访问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网站:www.hljupress.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战争中,明清战争以其旷日持久的长时段、波澜壮阔的画卷、层出不穷的英雄人物,备受世人关注。明清之际的时论,以至今日的学界,明清战争始终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史学界,有关明清战争的论著也层出不穷,明清战争史颇让人有种无处置喙之感。沈一民博士敢于在这一领域中继续求索,无疑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清南略考实》以“南略”统领史实,将1644年以前明清双方在华北战场上的角逐进行了细致的勾勒。首叙清朝统治者确立“南略”政策的背景及原因,继之以“南略”过程的描述,对明朝政府及明朝军队的反应也予以关注。在描述战争过程的同时,作者对影响明末华北的灾害与瘟疫也给予了浓墨重彩的叙述。从中不难看出“南略”的逐步扩大化不仅仅是明清两朝实力对比变化所使然,自然因素的制约同样不能忽视。末尾,作者用一章的内容,从华北地区、明朝、清朝这三个方面,对“南略”的影响进行全面定位,表达自己的新见。统观全书,作者在几个方面的努力值得注意。

作者遍览前人立论,结合原始史料,对每一次“南略”的前因后果、过程、明清双方的举措,一一条理清晰地予以说明,最终将“南略”的次数确定为七次。也佐证了郑天挺先生、李洵先生的研究。

作者扩大考察的视角、范围,将“南略”视为清对明作战的

“第二战场”，以论述偏居东北一隅的清政权对庞大的明王朝实行“伐大树”战略的具体实施。认为，自1618年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城开始，直至1644年清军占领北京，在短短的26年中，明清之间的大小战役数不胜数。实际上自1626年明朝取得“宁远大捷”、1627年“宁锦大捷”后，明清双方在关外战场一直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双方的大规模战争只有1631年大凌河之役、1640—1641年的松锦决战这两次。单凭这两次战争根本无法从根本上摧毁明朝的军事力量，确立清朝的优势地位更是无从谈起。清朝正是通过前后七次的“南略”，从根本上改变了明清力量的对比。在“南略”中，袁崇焕被冤杀，卢象升、孙承宗、鹿善继等一大批明朝的良臣强将葬身于清军的铁蹄之下。在“南略”的过程中，明朝的力量被一步步地削弱。相反，清朝却通过“南略”获取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富而壮大。

在描述明清双方军事角逐的同时，作者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南略”不仅是明清之间的军事斗争，还影响华北的地方社会。作者依靠档案资料，指出在“南略”过程中有200万左右的华北人口，包括普通民众及士绅被清军屠杀，加之民众对清军残酷屠戮而明军又抵抗无力的认识，这对华北社会百姓的打击无疑是致命性的。作者又结合自然灾荒论述其影响。认为当时百年不遇的灾荒和瘟疫，使得本来就脆弱的华北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之中。为了解决基本生存的需要，华北各阶层在1644年以前就放弃了对明朝的支持，转而寻求新兴的大顺政权的庇护。所以我们才会看到，1644年李自成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控制了整个华北，而清朝同样也仅用三个月征服统治了整个华北。从这一角度而言，在当时的社会、自然条件之下的“南略”，已不仅体现为军事战争，同时也成为影响明清之际历史走势的重大政治事件。这种认识确切与否，有待学术争鸣，其尝试性探索是值得肯定的，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明清之际史料繁多,有清人的,有明人的,有官方的,有私人的,立场不同,所记述的史事在取舍、述评、词语反映的程度及感情色彩等方面,会有所不同。需要尽可能多地搜集,并作鉴别、分析,在不同记述中整理出比较接近客观事实的内容。而作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今人,也有一个不偏不倚地叙述与分析认识的问题,还要避免某些概念、模式的框定,研究才可能深入,观点才可能妥帖、平实。因而,这段历史的研究难度较大。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努力,也体现了其研究的价值。

以上只是我阅读书稿得出的片段印象,由于对这段历史了解不多,更谈不上对史料的广泛搜集与解读,因而所述不一定正确,权作导读线索介绍给读者。读者方家关注这段历史问题,对作者的考察角度、分析感兴趣,与作者切磋,则研究又会推进一步。我想这也是作者所希望的吧。

杜家骥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于南开大学

目 录

绪论：新政治史的尝试	1
第一章 清南略的过程	27
第一节 清南略次数的确认	27
第二节 清南略的历史背景	38
第三节 天聪朝的四次南略	49
第四节 崇德朝的三次南略	63
第二章 南略期间华北地方所处的困境	80
第一节 明朝军队的反应对清南略的影响	80
第二节 灾荒之于华北地方的影响	93
第三节 瘟疫之于华北地方的影响	113
第三章 华北地方对清军事入侵的反应	124
第一节 1629 年南略时地方官对军事入侵的应对 ..	124
第二节 士绅守城作用的个案分析	139
第三节 社会各阶层在应对危机时各自的反应	156
第四章 清南略的影响	176
第一节 对华北地区的影响	176
第二节 对明朝的影响	196

第三节 对清朝的影响·····	214
第四节 对明清之际历史走向的影响·····	239
结 语·····	258
参 考 文 献·····	263
附 录·····	281
清南略参考图一·····	281
清南略参考图二·····	282
后 记·····	283

绪论：新政治史的尝试

明清战争起于1618年后金对抚顺的进攻，止于1662年吴三桂活捉南明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前后连绵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场战争的规模性、残酷性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争。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仅几万人的后金军队击败了号称四十万的明朝精锐；1626年的宁远大捷，近代火炮头一次在战争中被大规模地使用；1642年长达两年的松锦决战落下帷幕，明朝13万军队尽丧关外。其间涌现的可歌可泣的人物，如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等一连串的名字至今仍为我们所称道。扬州十日、嘉兴三屠、江阴守城等一系列抗清事件也始终烙印在汉族的心目中。明清战争始终是学术界、乃至平民大众的关注对象。

虽然众多前辈学者在明清战争这块园地里辛勤地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纵观这些研究，仍有稍许的遗憾。他们大多把研究的视角或是集中于关外的明清战争，或是集中于论述偏居于南方一隅的南明抗清战争，对于清（后金）南略却缺乏应有的关注。

清（后金）南略是指：在明朝建立起关宁锦防线（宁远、锦州与山海关联结为一体）后，明清双方在关外战场陷入僵持局面之时，皇太极为了扭转局面，绕过了关宁锦防线，从山海关以西长城各关口入塞，实施对明朝的打击，开辟了对明朝作战的第二战场。自1629年至1643年的15年间，清（后金）先后7次自山

海关以西长城各关口入塞,对明朝统治下的京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进行反复的屠戮和抢掠。本书试图对清(后金)南略的过程进行详尽地梳理,并把它还原到明清战争的大背景之中,给予它应有的地位。

然而笔者的意图并不仅及于此,实际上本书试图吸收区域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一种新的政治史。这种新政治史的尝试,首先是由当前政治史自身发展的困境所决定的。

政治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包含非常广泛。“一般地讲,它包括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含政治学说史)、政治运动史(含农民战争史)、政党史、民族关系史、国际关系史、政治人物研究等。”^①从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近代中国确立之后,政治史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建国后“除了社会经济史因论题内容与之相呼应,可以配合其某些讨论而拥有较为显赫的位置外,‘历史学’几乎完全可以和‘政治史’划等号”^②。但是这种格局随着20世纪80年代“史学危机”^③的提出,在学者们不断探索应对之道的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通过“史学危机”的检讨,历史学开始不断自我反省和重新定位,随之而来的“是‘三论’热、历史发展‘合力论’和‘历史创造者’的争鸣、还有‘年鉴学

① 白钢:《中国政治史》,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

②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③ “史学危机”,即“如何突破以阶级斗争和革命叙述为框架的政治史史学范式,建立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范式。”(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20年学术经历之检讨》(《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危机表现在:没有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精于微观,疏于宏观,不能从本质上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漠视或不能解决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课题,在新技术革命时代的挑战面前力不从心;历史学的价值不是见涨,而是下跌。青年人对历史学兴趣不大,青年学子选定历史学为其终身事业而潜心钻研者日渐稀少,学了历史而改行的日见其多;史学论文质量不高,撰写的学术论文难发表等。”(王玉德、姚伟钧主编:《新时期中国史研究争鸣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派’的引介、跨学科方法的讨论、‘文化热’以及‘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倡导”^①。在“还历史以血肉”的旗帜下，社会史等新兴的分支学科迅速勃兴，与此相对，政治史逐渐沦为边缘学科。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科方法大量引入历史学的今天，政治史的生存空间越发狭窄，以至于杨念群先生用“政治史为什么‘消失’了”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描述当下政治史的境遇。

政治史的困境并不是意味着政治史的死亡，而是一种由于缺乏必要的研究范式而被凸显出来的“尴尬”。在发展过程中，政治史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模式，即“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②。这种只有“骨架”缺乏“血肉”的研究正是近来史学界进行批判的对象，成为众矢之的。另一方面，在其他分支学科不断吸收新的理论与方法并蓬勃发展之时，政治史的自身改造却仍停留在旧有的框架内，尽管有的学者将社会分层理论、政治学的相关理论等理论引入政治史的研究之中，但仍无法弥补既有的缺陷——缺乏“血肉”。以至于到了21世纪，邓小南先生依然认为：“该领域的研究面临着寻求学科生长点的迫切问题。”^③

为了让政治史重获新生，为新政治史寻找生长点，在新的时期内学者们紧紧围绕着事件、人物、制度这几个政治史研究中的关键内容，纷纷尝试、摸索新政治的路径。

一个努力就是邓小南先生提出的“活的制度史”。“所谓

^① 邹兆臣等著：《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②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③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页。

‘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而首先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官僚政治制度不是静止的政府型态与组织法,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有‘运作’、有‘过程’才有‘制度’,不处于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无所谓‘制度’。”即突破“就制度讲制度”的传统框架,一方面是打破王朝的天然鸿沟,进行“跨朝代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注重“关系”的研究,将“制度置于活动的场景之中”,注重“制度之间的互动,制度与非制度因素的互动”^①。

二个努力是建立“事件路径”的历史。“事件路径”的研究范式是针对以往研究中以“人物——事件史”为叙述中心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把事件本身当做研究对象、研究实体、研究领域,力求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作出真实的描述,可以称之为‘事件史’;另一种则把事件视为历史上社会结构的动态反映,试图挖掘出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事件成了研究者透视历史的一种视角、一条路径,可以称之为‘事件路径’的历史。”^②也就是说,研究的中心不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以此为切入点,立足事件的描述去探讨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

三个努力是强调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对话,突出自身擅长的整体意识。邓小南先生在强调“活”的制度史的过程中,已经提到要注意官僚制度与政治史之间的密切关系,还要注意“它与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的课题也都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③。在此基础之上,杨念群先生更进一步,强调政治史与社

① 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

② 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兼论〈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③ 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

会史之间的关系。“‘政治史’要想真正得到复兴，就必须在与其它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①文中所提出的具体做法，行龙先生进行了很好的归纳。“第一，在研究乡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从地方故事的脉络中去理解国家政治渗透和表现的地区史路径。第二，把‘政治’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再研究，弥补地方史路径的缺陷，以理解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即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对近代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等进行研究。”^②

这种解读方式，“显然并不是要回到以往占据支配地位的作为范式的政治史，恰恰相反，他试图关注近代政治的强烈渗透性对中国民众生活的意味何在。在我看来，这种问题意识与其说是政治史的，不如说是社会史的，至少，它体现了被社会史取向改造了的政治史”^③。也就是说，杨念群先生的立足点并不是政治史，而是作为呼唤社会史中的“整体史”一种手段。这种努力实际上是在反思西方论著，尤其是（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对其中所体现的从社会史介入政治史的尝试的一种肯定。

四个努力是构建“政治—社会史”。徐永志、戴巍两位先生认为这一提法主要包含以下含义：“首先，就‘政治—社会史’的研究取向与内容而言，它不同于传统史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研究，在关注典章制度、事件人物的同时，它将政治史研究的视野投诸

①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② 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③ 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于广阔而生动的社会背景之中……其次,就‘政治-社会史’研究所依托的理论与方法而言,它应当在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前提下,走一条学科整合之路……统而言之……‘政治-社会史’研究应该是坚持唯物史观,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综合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政治权力、政治意识、政治体系、政治行为、政治发展以及在此之中的政治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结构、社会基本制度、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社会生活方式及社会控制与运行的互动研究。”^①

这些努力无疑对催生新政治史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除了邓小平先生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之外,政治史仍然处于暮气沉沉的状态。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无法回避的现实则是:一是理论过于单一,无法做到因时因事,各取所需。二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行龙先生在评述“重提政治史”时,就指出“其在具体操作上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②。“政治-社会史”范式的情况更是如此。三是由于视角和关注点的不同,无法搭建一个有效的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区域社会史——对话的平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是新政治史发展中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笔者新政治史的尝试是由于区域社会史在成为显学后,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所导致的。

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1986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举行的首届研讨会为标志,在冯尔康、乔志强诸位先生的倡导下,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成为当今史学界的一门显学。正如台

① 徐永志、戴巍:《政治-社会史:深化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② 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湾学者杜正胜比较大陆复兴的社会史与法国心态史的学术追求后所指出的:“历史研究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应是20世纪历史学到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普遍要求。”^①在社会史广泛开展的基础上,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将研究投向地域社会史。“这种转向既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广度和深度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拓展中国社会史研究之必然。”^②因为“社会史研究必然要在研究特定的时空内展开,社会史必然会导向区域史的研究”^③。

所谓地域社会的研究是指:以某一具体的地域社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地域社会的观察和总结,来探讨宏观的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从空间上,以地理、行政区、市场等标准划分地区单位,将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这是区域史研究的方法。”^④

地域社会的研究不仅仅是方法上的一种尝试,更重要的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中国自古就有编纂地方志的传统,今天从省志直至村志的编写就是直接承继这一传统的产物;但是由于视角的转换,使得新版地方志的编修和地域社会的研究成为南辕北辙的两类事物。新版地方志的特点,丹麦学者李来福在对《山东通史》批评时指出:“省通史成书之时便有着成为有地方

① 杜正胜:《什么是社会史》,《新史学》1992年第4期。

② 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③ 唐力行:《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④ 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特色的国家史副本之势,而不是该省的历史。”^①赵世瑜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当地方史的编写成为既定的国家史、甚至世界史等等宏大叙事的地方版时,无论它是以省为界,以市为界还是以村为界,它就都与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分道扬镳了。”简单地说,地域社会的研究“在于如何从地方的视角去重新理解中国和世界,而不是像以往或者现在许多论著依然如故的那样恰好倒过来。我们往往是用具体领域的研究去印证或者填塞宏大叙事的框架结构,而不是从具体的领域或空间出发,去质疑或者至少是重新思考这个宏大叙事的结构”^②。

对于中国区域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始于20世纪上半叶由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取得了成果也是斐然卓著。^③在这一风潮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也对地方基层社会的研究产生极大的兴趣。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成就,即1948年费孝通、吴晗两位先生在“中国社会结构讨论班”^④的基础上出版的《皇权与绅权》。另一方面,“傅衣凌、罗香林等对于收集土地契约、碑刻、族谱等民间文献所作的努力,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理解地方

① (丹麦)李来福:《从1994年版〈山东通史·明清卷〉反思地方史编纂》,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499页。

② 赵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③ 从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葛学博(Daniel H. Kulp)对广东潮州凤凰村所做的调查,到中国本土学者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等先生的杰出研究,都对后来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参阅Daniel H. Kulp,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25;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1989年版);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④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社会的主要基础”^①。正是在这两位先生的努力之下，区域社会经济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优秀的研究传统未能坚持下来。

当地域社会研究在国内处于停滞不前的同时，国外的研究学者也开始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这种转向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年鉴学派强调“长时段”和“总体史”，主张历史是一组体系或结构的复合体，各体系或结构有其自身的内聚力。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把历史的时间划分为长时段（地理时间）、中时段（社会时间）和短时段（个体时间），认为长时段的结构因素对中时段、短时段的事件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地理概念重新被引入历史研究，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区域”。

美国学者柯文精准地概况了美国学界内的转向。《在中国发现历史》总括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中时，提出以中国为中心取向的特征之一就是区域研究。“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采取这种做法的主要依据是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为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②

稍后，日本中国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研究也蓬勃地发展起来。1981年名古屋大学在森正夫教授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史研讨会，1982年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地域社会的视点——地

① 程美宝、蔡志祥：《华南研究：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实践》，《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01年第22期。

②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8页。